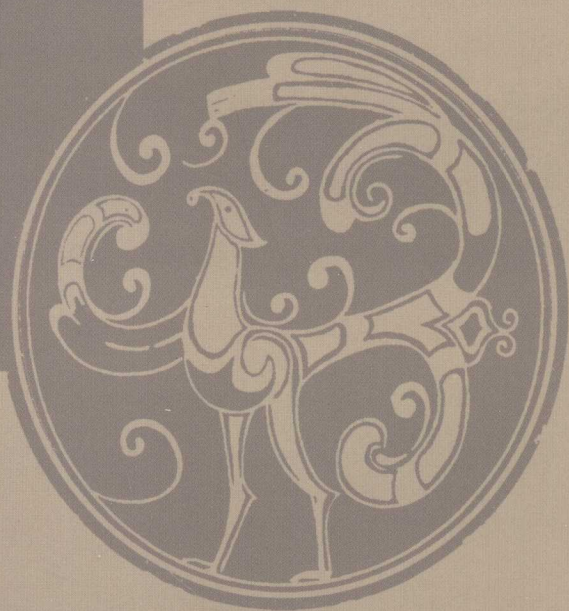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
献研究
中心

集刊

[第四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G256.1-55
B380:1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 研究中心集刊

第四辑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安平秋	孙钦善
李 零	李家浩
杨 忠	董洪利
漆永祥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4辑/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301-06776-3

I. 北… II. 北… III. 古文献学-研究-中国-丛刊
IV. G2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714 号

书 名: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四辑)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776-3/G·095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34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mm×1168mm 32 开本 16.25 印张 417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阴法鲁先生纪念专辑

- 阴法鲁先生简历…………… (2)
- 朗如日月,清如水镜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严绍璁(3)
- 想念阴少曾(法鲁)先生…………… 白化文(11)
- 我的深情悼念…………… 向仍旦(16)
- 乐于奉献循循善诱的好老师…………… 熊国桢(18)
- 春风春雨忆先生…………… 董锡玖(22)
- 深切怀念阴法鲁老师…………… 段宝林(29)
- 回忆我的老师阴少曾(法鲁)先生…………… 刘玉才(32)
- 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 裘锡圭(36)
- 试说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 关于赓、武、韶、夏之乐一段文字中的几个字词…………… 沈 培(58)
- 甲骨金文旧释“尤”之字及相关诸字新释…………… 陈 剑(74)
- 史书与占卜…………… 刘 瑛(95)
- 《论语》版本考…………… 顾永新(101)
- 荀子礼义探寻…………… 王丽萍(121)
- 浅谈郑玄的以礼注诗…………… 吴 鸥(129)
- 汉代诸子学论略…………… 高路明(141)
- 汉唐《汉书》古注考…………… 杨海崢(153)
- 《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补正…………… 王 岚(162)
- 宝县生平及著作考述…………… 许红霞(191)
- 也谈北宋馆阁编目与校勘之关系…………… 李 更(205)

《慈湖诗传》试论·····	陈晓兰(222)
流失东瀛的两部元人文集·····	顾歆艺(238)
试论明清礼教背景下的宗法家族生活·····	刘玉才(246)
清代训诂学对“因声求义”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孙钦善(262)
东吴三惠世系考·····	漆永祥(292)
“阴阳说”与日本古代国家的建立·····	刘 萍(306)
先秦文字中“=”符作用浅析·····	李若晖(321)
说西周金文中的“嗣”字·····	张富海(337)
中山国题铭考释拾遗(三则)·····	董 珊(345)
古籍注释的一种方法:引典注释法·····	应三玉(355)
“叟”与古代的老人政治·····	徐 刚(370)
《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 理学话语中的用法辨析·····	李畅然(378)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编刊始末考略··	胡玉冰(390)
苏洵《易》学浅论·····	谷 建(404)
周敦颐文集版本考略·····	刘小琴(417)
《全宋诗》订补初探·····	包菊香(431)
蕉园女子诗社成员考略·····	宋清秀(464)
论章学诚校雠理论的发展脉络·····	梁继红(477)
早期禅宗思想中如来藏与般若的 融合及顿渐问题之试探·····	胡元玲(509)



阴法鲁先生

阴法鲁先生简历

阴法鲁,男,汉族,1915年7月出生,2002年3月逝世。山东省肥城县人。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毕业。1942年昆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历任昆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助教,武昌华中大学(迁滇)副教授,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北京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音乐舞蹈协会副主席,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等职。

阴法鲁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史,侧重古代音乐舞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以及社会调查资料与古文献的结合。主要论著有:《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唐代西藏马球传入长安》、《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舞蹈》、《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与杨荫浏先生合著)、《敦煌乐舞资料的历史背景》、《唐代的音乐与曲子词》、《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活动与舞蹈文化交流》、《古文献中不同语言的译语校注问题》、《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的音乐活动》、《中国古代韵史札记三则》、《考古资料与中国古代音乐史》、《历史上中国和东方各国音乐文化的交流》、《重读〈隋书〉》等。阴先生还参加了中华书局本廿四史的点校工作,20世纪80年代,与许树安合作主编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化史》,荣获教育部等多项奖励。

朗如日月，清如水镜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在阴法鲁先生周年忌日追思会上的发言

严绍璎

各位长辈，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以一种沉痛的，沉重的，同时，也还是满怀希望的心情，在这里怀念我们学术界的一位真诚的学者，一位可以在任何时候都称得上是“学界好人”的老先生——我们尊敬的阴法鲁教授。感谢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组织了这样一个可以表达我们对阴先生追思的集会。我借用这个有意义的集会和这个神圣的讲坛，与各位一起，怀念我们与敬爱的阴法鲁先生在一起的，而现在已经失去了的日子，回忆他的人品、人格、学业和他对我们孜孜不倦的教诲。

说是沉痛的心情，因为一年前，我失去了阴先生这样一位慈父般的导师。阴法鲁先生与我的父亲恰恰是同庚。我在1959年告辞我的父亲，来到北大，我在我父亲他老人家身边，只生活了18年多一点。阴先生1960年应魏建功先生的邀请，来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任教，我在他的身边，接受他的教诲却有四十多年。我从他的学生，到一个专业教研室共同任教；从担任他作为古典文献专业主任的助手，到接替他担任专业主任，40年间，阴先生以他自己高尚的人品和精湛的学业，教育和影响着我。这种教育和影响，不是我们今天在学术界，在数不清的扑面而来的出版物和新闻媒体上，乃至在我们的课堂上常常可以见到的那种夸夸其谈的自我张扬，更不是那种故弄玄

虚的噱头,而是以他的默默的精神和默默的行动,慢慢地渗透到我的精神和血液中,使我懂得应该怎样做人和怎样做学问。

阴法鲁先生是20世纪我国音乐史研究的杰出的学者,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从事以解读宋词曲牌为中心的乐谱复原的研究,成绩卓著;对解读敦煌曲谱,也有诸多的贡献。1962年是我国敦煌文献发现60周年纪念,阴先生在北京大学组织和主持了“敦煌发现60周年纪念文化系列讲座”,这是当时全国惟一的一个极高水平的学术系列。20世纪70年代德国出版的《东洋学学者辞典》中,收入的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中国学者,也只有阴法鲁先生一人。请各位注意,这部《辞典》与80年代下半叶开始的,依靠出钱买名的商业辞典是完全不同的。这无疑是中国学术界的光荣和骄傲。80年代初,我国开放之后,他是最早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出任人文学科客座教授的中国文化史学家,并受到当时伊朗王国政府教育部的邀请。他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发起人和创办人之一。作为著名的中国音乐史家,阴先生在80年代担任了可以说是“誉满全球”的大型歌舞《丝路花雨》的艺术顾问,并出任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1994年我参与《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十卷本总主编的工作,曾经与“艺术卷”的主编,日本著名的艺术史学者上原昭一先生协商该卷的撰稿人。上原教授提名一定要我们协助,邀请中国杰出的艺术史学家阴法鲁教授参加。上原昭一说:“贵国在东洋艺术史的研究方面,我以为有两位先生最具名望,一位是常任侠先生,一位是阴法鲁先生。可惜,常教授已经去世了,现在健在的只有阴法鲁教授了。”

是的,阴先生以他自己的研究,在中国文化史领域中,开拓了新的领域,建树了永存的业绩。

阴先生是一位朴实无华、踏实诚恳的长者。他从来不张扬自我。我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在座的我们各位,接受过他教育的这么多的学生,乃至他工作了几十年的北京大学和这个大学的各级领导,究竟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创造性的业绩,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为国家和民族

所赢得的这样的荣誉！

现在的学术界，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不管是有业绩的，还是没有业绩的，常常热衷于标榜自己是“国内第一人”，“国际第一人”；就是在我们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如此丰厚的北京大学，也总有一些先生，张扬声势，造作名位，把“北大”作为他们的名利场，把那些无知的年轻人，搞得心浮气躁，利欲熏心。

记得王瑶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名言：“北京大学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种是他靠北大出名的人，一种是北大靠他出名的人。”话虽然尖刻了一些，倒是一针见血。我们尊敬的阴法鲁先生，40年来，他就是为北大出名，而默默劳作；他就是为中国的学术出名，而默默劳作；他就是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奋起而竭尽全力的“北大人”！

熟悉阴先生的各位，和他切实共事过的各位，我们一定都能够体会到，先生从不夸夸其谈，更不“作秀”——朴实无华，踏实诚恳，默默劳作，光明磊落是贯穿在先生整个血液中，也流淌在他的整个生命的过程中的！

鲁迅先生当年曾经写作了著名的记事性散文《一件小事》。他在喧嚣烦恼的大千世界中，从默默劳作的普通劳动者的身上，从一件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中，他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精神，发现了支撑着我们民族生命的脊梁。我们这些生活在阴先生身边的学生，40年来感受先生的高尚人格的“小事情”，不仅仅与鲁迅先生的体味相同，而且多少已经超越了鲁迅先生所体味的这样的“一件小事”的境界！

在我自己的学习学术生涯中，时时得益于先生的热忱无私的教导。记得70年代的末期，当我刚刚开始涉足东亚文化关系史课题的时候，我曾经就“日本的能剧”和“日本的猿乐”，以及“猿乐”和唐代的“散乐”的可能的联系，多次请教阴先生。阴先生就唐代“散乐”给我很多的教导，并且把他收集的有关中国音乐史的，由他自己装订的6册资料全部交我阅读。1979年5月，“日本能剧团”首次访华，只演

一场,连续两天。阴先生特地从音乐家协会为我争取一个席位,观众只有四十余人。先生一直对我说:这方面的课题非常有意义,我们没有人研究,你一定要坚持,做几年就一定要有成果的。直到今天,我常常回忆起当年刚刚踏进学术之门的时候,先生以自己对于后辈的满腔热忱,以宽阔无私的胸怀,引领着他的学生。

先生的教导是热忱无私的,但同时也是严格的。记得我第一次从日本回来,讲到在京都宇治市有一座万福寺,它是日本临济宗中的“黄檗(bò)宗”的总本山。当时,我把“黄檗宗”说成了“黄檗(pī)宗”,完全是望文而定“声”,以为它与“劈材”的“劈”形近而同声,其实是不认识这个字。第二天,先生在路上特意叫住我,说:“老严(阴先生称我们这些小辈,都是老字头的,老安,老陈等等),你说的京都的那个寺庙,应该叫黄檗(bò)宗,不是黄檗(pī)宗。有一种树木,就叫黄檗。”先生还说:“古文献出身的人,这个字可要认识。”我真的一时脸红,先生又宽慰说:“不过,陌生的字很多,平常留心就可以了。”阴先生真是用心良苦。他不在现场指出我的错,完全是顾及我的面子;但是,他一定觉得他是有责任必须告诉我“这个字念错了”,而且他也一定认为,一个古文献出身的年轻教师,念错这个字是不应该的。所以,他在路上单独把我叫住,纠正我的错字。每念及此,我真是对先生十分地感激。

在阴先生的精神世界中,他总是把“学术的真实”与“坦诚的胸怀”结合为一体的。就在我请教他关于唐代散乐与日本中世纪戏剧的可能的联系的时候,先生表现的“学术的真实”令我非常地敬仰。他说:我知道唐代的散乐传到了日本,他们的宫廷舞乐中,有很完整的“兰陵王”,也称“罗陵王”,我们这里不全了。他们在宫廷大典中要演奏“万岁乐”和“太平乐”,他们称为雅乐的,都是从唐代传入的。但是你所说的“日本能乐”,我听说过这个名词,但是,不知道是怎么表演的;你所说的“猿乐”我也不大明白,不好随便说它们与“散乐”的关系。先生在他的学生面前,表现出的这种对于学问的真实的坦诚的

态度,不是令我吃惊,而是令我深深敬仰。我们知道,阴法鲁教授早年撰写的《从音乐和戏曲史上看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一文,与常任侠先生撰写的《唐代传入日本的音乐与舞蹈》一文,共称 20 世纪论述中日两国艺术文化关系的“双璧”。但是,阴先生在他的学生面前,不摆权威的架子,更没有倚老卖老,绝对不作“不懂装懂”的模样,而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学问的真实,更是人格和人品的真实!

在我的几十年的生活中,接触过许许多多的学术权威,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印记。当我今天,在本门学科中也多少有了发言权的时候,我常常以阴先生和其他诸多的先生为榜样,训诫自己,一定要学问真实,人品真实,心怀坦荡,朴实无华。

阴先生是一位学者,他的人格力量当然首先表现在学术领域中,但是,熟悉他的人几乎都能够感到,在生活的各个细节中,他的人格力量是一以贯之的。

我接任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主任的时候,阴先生已经 70 高龄了。但是,学校或者系里布置的各项公益工作,例如卫生大扫除,他每次必定躬身参加,扫地,擦桌子,甚至还会爬到桌子上去擦玻璃窗。我们放眼望去,每一次在现场,就连那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也未必前来参加,更有哪位六十几岁的先生还来大扫除的?还有哪位大先生前来扫地的?我不是责怪大先生们不来扫地,而是更加敬仰来参加扫地的阴先生!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每次阴先生一定都来的。他是为名吗?先生不需要名!他是为利吗?这样的大扫除能给先生什么利!先生怀抱着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啊!

先生的社会责任感是与他的朴实的心连接在一起的。我担任专业主任之后,有时候难免要请一些来往的客人吃饭。这当然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情——因为吃饭没有公款,那当然是谁请客谁出钱。对一些来专业访问的客人,不请人吃饭,我觉得有违中国人的习俗,又使得北大和我,都没有了面子。我当时工资 70 来元,一顿饭十五

六元或者二十多元不等,弄多了,就有些不胜负担。当时阴先生已经不担任主任了,古训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只要先生知道有饭局,他总会塞给我一些钱。记得有一次请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小川环树吃饭,阴先生出了40元钱,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其实,这顿饭和阴先生真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小川与北大的另一位教授同为1937年的同班同学。这位教授提出,他要以他的名义请正在访华的小川先生吃饭。这位教授示意,这顿饭应该是以他的名义请客,而饭钱则应该是由专业来承担,这使我十分为难。阴先生知道后说,“饭是要请的,这是体现他们的同窗情谊,是两国的面子。定个五六十元钱的饭,我出40元,余下的就请他出了。”阴先生的这个决定,使我在感动之余,也很为难——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面子和名声是别人得的,掏腰包的却是阴法鲁先生。是的,这些确实都是“小事”,但它展现的却是先生的心灵世界。阴先生对于公众事业的责任感,与他的学术的人格力量一样,令人敬仰,令人心碎。

当此刻我们在这里追思阴先生的时候,回想与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先生“进不求于闻达兮,退不营于荣利”,“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先生的一生,朴实无华,踏实诚恳,默默劳作,光明磊落——这无疑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最需要呼唤的民族的脊梁和民族的精神!

今天,当我们面对阴先生的永存的业绩和“朗如日月,清如水镜”的人品和人格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沉重的。这种沉重,是来自于我们深深的愧疚。我们今天在这里追思先生,是对自己的愧疚之心补救于万一。

我们对不起先生——我认真地这样说。

阴先生作为几乎与20世纪同龄的学者,尽管他有独特的学术贡献,尽管他有这样高尚的人格力量,尽管他在校外和在世界上被学界认知,但他在我们生活的学术圈子内竟然未能担纲现在几乎每个教授都能担任的“博士生导师”,在茫茫的学海中,竟然没有一位阴先生

学术的直接的传人！他的最优秀的学生，也始终未能安排在最能发挥专业特长的学术岗位上！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当今包括北大在内“敦煌研究”的谱系中，怎么会对阴先生的敦煌曲谱复原研究和1962年由他主持的当时全国惟一的“敦煌发现60周年纪念文化系列讲座”，时间长达半年，却只字不提。这个讲座是在那样的年代里，由阴先生组织和主持，并有向达先生、王重民先生、启功先生等参加的。坦率地说，现在被称之为“敦煌权威”的有些人，当时连“敦煌学”的门也还没有入呢！作为后辈，我们怎么会这样的“健忘”？作为从事人文学术的研究者，我们怎么会这样的没有学术史的概念？怎么会这样地没有“历史感”呢？或者说，我们怎么会这样地“无知”和“狂妄”呢！

是的，我们已经把阴先生忘记了！

当年，有关方面发出的阴法鲁教授退休的文书，是经由我的手送达阴先生本人的，退休文书上清清楚楚地写明：“退休待遇同司局级。”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校长在行政上就是等同司局级，尽管把北大校长行政定级为司局级是天大的笑话，但却是一个事实。因此，当时，我很欣慰，觉得阴先生在退休后，可以获得与北大的校长们相当的待遇，但事后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无比的遗憾。

这使得我们在追思先生的时候，心情显得格外的沉重。

有人说，在现在的生存潮流中，“老实”和“好人”便是“无用”的代名词。它多少使人有点不寒而栗。去年，尊敬的阴先生离开了我们，当我在国外听到这一噩耗，心中有无比的悲伤；然而，接着我就听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消息，说送走先生的那一天，现场只有11人。我仰望苍穹，唏嘘再三——先生就这样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生命的行程，与他的人格一样，不事张扬，朴实无华。先生的生命的精华，凝聚在无限的苍穹之中，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和精神！

今天，可以告慰先生的是，生活和学术本身都没有忘记阴先生。

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再次显示了学术界同人和他的学生们对先生人品和学术的敬仰，显示了我们大家向这位 20 世纪的“学界好人”表达的敬意，更是先生崇高的人格力量向活着的人们的生存世界再次显示了它的永存的生命力。

当先生还在病中的时候，他的学生们便筹划着要出版先生的“文集”，商务印书馆的任雪芳女士已经开始具体筹办，只是由于先生的情绪波动，这件事情便延宕至今。现在，中华书局崔文印先生各位，又启动了这一编纂。我们都是先生的学生，但愿先生的业绩能够永存。

今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鞠躬尽瘁，为民族的振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正是成就着先生的事业和他的理想。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今天的追思会，尽管是这样的沉痛和沉重，但是，它内涵的精神，与先生的意志和愿望一脉相承，从而透露出它的积极向上和乐观愉快的精神。

阴先生，他的事业和他的精神，会永远地存在！

——2003 年 4 月 6 日上午北京大学英杰会议中心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前副所长，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前主任。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东亚地区协调委员会主席）

想念阴少曾(法鲁)先生

白化文*

我调回北大工作以后,除了原来上课教导过我的十几位老师以外,逐渐和季希逋(羨林)、周太初(一良)、宿季庚(白)等位先生,当然更有阴少曾(法鲁)先生,有过接触。这就产生了称谓问题。教过我的,一律称为老师,自称学生,不成问题。但我不敢说是上述这几位先生的弟子,因为没有听过课。我还怕有的先生的嫡系弟子耻笑,说,你念过梵文么,学过中古史么,干过考古么?妄称“学生”!可是,我终究是晚辈,是后学,称呼上颇费斟酌。一天,在周太初先生府上侍坐,趁机把这个问题说开了。我说,《后汉书》中常讲“门生故吏”,周家可比袁安家族,我就算您的“门生”得啦!后来我对季、宿等位先生和阴先生,也用这个称呼了。几位先生看我诚恳,并不反感。小结:我凑合着算是阴先生的门生。

阴先生与我同出身于北大中文系,您可是老一辈的了。您所在的那一班,1937年七七事变前刚读完二年级,全班25人,后来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有阴先生和周定一、俞敏、柳存仁、傅懋勤、逯钦立、陈士林等位先生,百分比在30%左右,应该说是很“得士”的一个班了。1936年毕业班12人,学术界就出息了周燕孙(祖谟)先生一位。1937

*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年有吴晓铃。可见那时候毕业容易，一生中出人头地甚难。故而沈兼士先生有“北大中文系每三年必有健者出”的感叹。窃以为，这句话当从另一面来理解。附言：沈先生单指语言组而言。解放后一大段时间内，组织分配，飘茵落溷立判，很难翻身，那是另一码事了。

抗战开始，阴先生这个班到了西南联大，上三年级。间关险阻，到达昆明的是少数。1939年毕业时，北大9人（仅为在京时的36%），清华4人，后来在学术界有名望的七八位，占55%以上。在联大九年九个班中，也是最得人的了。

阴先生大学毕业后即入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深造。是为西南联大时期的头一班。这一班更是人才济济。大略地说，中国文学部有阴先生和逯钦立（1943年方毕业）。1941年与阴先生同时毕业的，有语学部的马学良、周法高，史学部有杨志玖、王明，哲学部有任继愈等位先生。这一年可说成品率百分之百。单从研究生服务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无废品成功率来说，我认为，后来的北大文科从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这是精兵政策的结果，与当代的大批培养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当时的研究所集中了北大、清华的全国最优秀的导师，又有抗战时期昂扬向上的气氛，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才造就了这么一大批人才。“汉之得人，于斯为盛”矣！

我们也应该看出，和培养飞行员实行淘汰制一样，从30%到55%，再到100%，阴先生经历的奋斗过程艰辛异常。后来我与阴先生闲谈中着意指出这一点，阴先生含笑不语，我想是默认了。

阴先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词与唐宋大曲的关系》。即使到了现在，这门学术也得算是一门“绝学”，敢碰的人极少。后来此学术成为阴先生一生研究的重点。阴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即任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惟一的“研究助教”，而不是单纯的“助教”（当时的助教有十余人），可见他的地位特殊。我想，这是因为他的这一套别人不会，系里也不安排这样的课，给谁当助教也不行，于是只好自行研究了。我也曾就此事向阴先生阐明自己的想法，先生亦含笑